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回归自然与天道

——纪念邹化政先生

王天成

〔摘要〕邹化政先生的一生一直在探索着哲学的真理。在不同的阶段他所探索的主题是有差别的。最后形成的《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集中表达了他对哲学最终的逻辑思考。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被邹先生称为广义的“自然哲学”，它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大部分。在这里，邹先生达到了一种对自然的生命的理解，同时也显示了邹先生超越自我、回归自然的境界。

〔关键词〕邹化政；自然；天道；本体论

〔收稿日期〕2017-07-12

〔DOI〕10.15939/j.jujss.2018.01.zx3

〔作者简介〕王天成，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长春 130012）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往往注重历史的方法。历史上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分，实际上，单纯的我注六经是不多的，往往大多数人都是六经注我。但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是在经我之间转换。西方的主流学问不是如此，它是用逻辑的方法谈学问的，单纯历史的方法也用，但不是主流。近代新学兴起以来，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也在学逻辑的方法，比如说中学就在教授论说文要有“论点”、“论据”、“论证”等等，这实质上就是在教逻辑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对于逻辑的方法我们用得并不熟练，所以我们做学问还不免更注重历史的方法。我们说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区分，并不是说它们完全互相排斥，其实逻辑的方法里面也有历史，历史的方法里面也包含逻辑，只不过是侧重哪一方面而已。所以，更为全面的方法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人使用这种方法，而西方使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

我之所以说上面的一堆话，实际上是想对邹化政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做一个简单的定位。前一阵子，我们的哲学界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实际上用的还是历史的方法，其中包含的逻辑的建构环节很薄弱。这就可能造成一个问题：学术表面上是生机勃勃的，但学理上又显得没有创造性。在我们学术研究的过去一些时段，甚至造成了西方人造理论，我们跟着人家研究人家造的理论，甚至把它叫做“和世界接轨”。其实，这种接轨当然有必要，但太过了。所以如果总是这样研究下去，中国的学问可能真的就衰落了。好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不仅要学人家的东西，还要进一步解决前人留下来的问题，不仅学着做，还要接着做。依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未

解决的哲学问题，寻求答案，这或许应该成为我们今后所努力的方向。邹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特别是对黑格尔，研究得很深入。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是，邹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却是一种以逻辑为主体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特别是黑格尔研究。邹先生研究康德也好，研究黑格尔也好，甚至是研究当代的一些哲学家，尽管也注重相关资料的考据，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更为注重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其中他特别注重的是黑格尔研究问题的方法，即思辨的方法。可以说，邹先生的哲学方法是这种思辨方法的进一步的发挥。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引领下，邹先生所阐述的哲学主题是建构性的，或者说是创造性的。

一般来说，哲学问题都是一些在各方面算作终极的问题，终极的问题就很少有定论。我们看历史上的一些哲学问题，人们对它们几乎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以这种看法的确定与否来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哲学就不是真理。但是站在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上看，不是真理的东西是不值得去追求的。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隐秘和误解。既然哲学问题没有定论，哲学不是真理，那么人们还去追寻它干什么呢？康德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说这些终极的对象，比如灵魂、宇宙、神等等，尽管不是真理、知识，但它也不是没有根据，它有基于人性的主观根据，所以他说形而上学没有客观根据（不是知识），但有主观根据（基于人的本性）。这样，康德就以“根据”为平台确立了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地位。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谬误，而是某种“似真”的东西。这种似真的东西可以作为人们的希望存在，而希望恰恰是人及人的活动的最高目的。康德的这种对哲学的定位已经表现得很大度了，比以后的某些经验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仅仅使人满足某种无谓的情感要大度得多，但黑格尔仍然不满意。黑格尔也站在根据这个平台上评判哲学，但却想把它上升为真理。或许他也受时人的影响，认为不是真理的东西不值得去追求，所以他必将得将哲学即形而上学上升为真理。这促使他从康德、费希特的主观性的视角转换到了客观性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真理的标准。

说这些是想说明，邹先生更类似黑格尔，想把形而上学确定为真理，或者说确立为知识或科学。所以我们看他学术生涯的每一步都试图用形而上学来解决哲学问题。但邹先生的形而上学又不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以精神来统摄一切，他的理由是精神有能动性，只有能动的东西才配得上起统摄作用。但邹先生坚持的是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又不是那种被动的物质唯物主义，而是强调能动性的唯物主义。从这看邹先生受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影响至深。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之中既包含唯物主义本体论因素，也包含人学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人们往往很难达到协调地理解。邹先生很关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同时也很关注西方近代到当代的人学理论。比如他在写《人类理解论研究》时，曾专门研究近代人学理论，同时对费希特、谢林的自我意识机能理论也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本体论，特别是怎样超出意识的内在性、确立起一种客观性的问题，即康德所说的“超验”问题。所以，他看到现象学之后，觉得现象学的直观理论可以搭建这样一种桥梁，就很重视现象学，并做过多年的研究。由此看来，邹先生对人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想澄清他的本体论。这也通过我经历的一件事情看出来。我有一段时间也对认识机能、直觉等感兴趣，并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和邹先生谈，他曾提醒，最终还是要落脚到逻辑、本体论，这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所以，他对认识活动的研究，对直观的研究，实际上是要成就他的思辨逻辑的通透性，最终还是要建立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也可以推而广之，他对人学的研究，实际上是要超越人学，上升为包含人学的形而上学，他也称其为天道之学或自然哲学。

前面提到他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不同于黑格尔，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的唯物主义不是一般的

唯物主义。一般的唯物主义是心、物完全对立的唯物主义，邹先生则更强调心物一体。这方面他崇尚斯宾诺莎，也更倾向于物活论，他认为物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物是包含精神在内的。这样，他就和黑格尔不一样了。黑格尔坚持精神是包含物在内的一个对立统一体，邹先生则认为物是包含精神在内的对立统一体。同时他和通行的唯物主义也不一样。所以他有时说他的理论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划清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界限，防止人们对他理论的误解。

我们的时代可能更崇尚丰富多彩，不太崇尚统一性。你在学术上用一些“主义”来统摄什么，容易引起现代世界的反感。所以邹先生建立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追求，可能被认为有点老，有点过时。其实，哲学总是有丰富多彩的时候，也有将这些丰富多彩归于统一的时候，因时而变。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对哲学的主题也是适用的。其实，中国和外国学术最初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国的先秦百家争鸣，西方的古希腊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就西方说，本体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是西方理性发展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环节。所以，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本体论，崇尚丰富多彩，这可以叫做现状，但并不代表真理，不代表天下大势。天下大势还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交替。从这个角度看，邹先生重建形而上学，建立“第一哲学”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

分合交替之所以在历史上成立，是因为无论分也好合也好，哲学的一些基础问题总是贯穿始终。这些问题涉及人的生存根本，关涉世界的终极价值和人的最高理想。但是对人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哲学的思考不能追求一劳永逸，就像人的生存、终极价值不能一劳永逸一样。从这个意义说，哲学的那些根本问题似乎没有定论，没有定论恰恰表明它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但这种没有定论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是有根本的价值取向的，这个价值取向是恒定的。如果否定了这种价值取向的恒定性，我们就很可能过于崇尚哲学问题的相对性，而忽视它的价值上的绝对性，从而丧失追求哲学真理的信心和决心。应该说，现在的哲学状况与此类似，大家抱住哲学的相对性，反对和消解那种崇高的绝对价值，这表明人们对哲学的信心是不足的。但哲学毕竟又是一门经典学科，为了成就这个学科，就只能把一些“丰富多彩”的问题拿来充数。最后造成的局面是哲学的表面繁荣，深层次的探索没有进展，邹先生曾经很形象地称之为“哲学泡沫”。泡沫有五光十色，但真理黯淡得多，当人们以欣赏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沫为美的时候，真理就会被筛除掉。但是，泡沫是要在短时间破灭的，哲学的出路还是要追求永恒的东西，追求真理。在追求哲学真理方面，邹先生的坚定性是令人佩服的。他坚信哲学真理的存在，并且也坚信他能够达到哲学的真理。这使他一生都在追求哲学的真理，我们从他最后写的著作《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追求，使他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包括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可以说，吉林大学搞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许多人，都受到过他的思想成果的影响。

邹先生追求哲学真理，同时他和黑格尔一样，坚信真理必须是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系统。但是，要成就一个系统很困难，需要做长期的努力。邹先生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探索过程，最终成就了一个体系，即他的《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长期以来，邹先生孜孜不倦地试图走出意识的内在性证明他的唯物主义，由此他提出了解决超验问题的思路，包括他的超验辩证法。晚期他认为现象学是走出意识内在性的一种关键的学说，所以大力吸取现象学的营养。这样，就使他从中期的认识论的研究中走出来，进入到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第一哲学”研究中来了。“第一哲学”在他那里实际上是一个自身显现的逻辑体系，他也称之为科学体系。邹先生的这种探索，即从主体开始最后走向“第一哲学”的探索过程，和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胡塞尔到海德格

尔的哲学转变过程很相似，康德和胡塞尔的哲学都具有主体哲学的特点，但从主体如何打通客体这个思路出发来解决真理问题，似乎对人来说很不容易做到，也可能这是人的意识能力的极限。这样，就使人们只能由意识哲学转换到形而上学，由认识论转换到本体论。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以这种有限的东西为标尺，只能成就有限的科学知识，不能成就哲学作为科学知识。所以我们看，黑格尔、海德格尔，都在其理论建立的起点上对主体哲学进行了批评，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意识哲学的批评，海德格尔对主体哲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等等。邹先生也对主体哲学进行批评，在这方面他和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做法是一致的。这实际上表现了哲学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人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但人的认识每前进一步，自信心也加强一步，人们就很可能在充满自信的前提下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当这种认识发展成为人的肆无忌惮并且成为潮流的时候，它的负面作用就会出现。这时候就需要虚心一些，转换一个角度。实际上在现在，随着科学技术通过资本的扩张，其“座架”效应逐步显现，所以人们都在考虑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从这个角度看，邹先生强调从自然出发，批判主体哲学，坚持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

邹先生的一生一直在探索哲学的真理。在不同的阶段他所探索的主题是有差别的，但是，邹先生最后形成的《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则集中表达了他对哲学最终的逻辑思考。应该说，这部代表他最终成果的著作是很晦涩难懂的，即使我们跟随邹先生学习多年，好多精细的环节、概念间细微的区别以及不同环节的过渡还是不明白。特别是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的一些细微思考和辨析，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好在有一个导论，表达了邹先生对第一哲学科学体系的总体看法。按我的理解水平，在这里我只能就这个导论介绍其中的一些大略环节。

大概说来，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是一种对（广义自然）哲学的逻辑思考，按他的话说，“是整个哲学系统的普遍基础”。^① 逻辑讲究共相，而哲学作为一种“学”又是知识。所以邹先生从知识共相开始讲起。他说“什么是哲学？纯就哲学之为哲学而言，哲者，明知而智慧的意思；学者，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从而哲学就是一个明知而智慧的学问或知识系统（学问即知识，以后我只用知识一词）。但是，明知而智慧的知识本身是一个共相：其他一切科学的知识，都可以是明知而智慧的知识。所以，在明知而智慧的知识共相对面，耸立着一个它的各种特定殊相明知而智慧的知识领域，前者，可称其为明知而智慧的知识共相，简称知识共相；后者，可称其为各种明知而智慧的知识殊相，简称各种知识殊相。”可见，知识的共相构成哲学研究的主题。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把知识共相理解为主观的，那就不是知识了，知识总有客观性，总是关于对象的知识。“知识共相，必须有为它所表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可能是知识共相以自身为反思对象的那个对象，因为这里说的是知识共相本身所表现的现象，亦即它的原始对象。那么它的此种对象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知识的原始对象就是外感显现中的“事物存在形象的实在性。所以如此，这乃是由于外感官确定性，是我们的最初所知——脱离了外感官所给予我们的确定性，我们面对的，便是一无所有的空白”。原始对象和知识共相一样，也是共相包含它的殊相。知识共相与它的对象——原始对象共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既没有无原始

^① 参见邹化政《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导论，以下所有引文出自“导论”者，不再另注。本节所有解释性的内容解释的均是邹先生《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的相关内容。因著作尚未出版，故无法标注页码。

对象共相的知识共相，也没有无知识共相的原始对象共相。从这个统一性的视角来看，哲学便可进一步全面地规定为：它是知识共相与其原始对象共相的对立统一。”

这种统一包含两个环节：一是感性知识共相与感性原始对象共相的对立统一，再者是理性知识共相与理性原始对象共相的对立统一。我们所说的“客观实在性”，无非是原始对象共相作为感性对象共相与理性对象共相的统一，前者是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后者则是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的本质。所以，“客观实在性便是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与其不同层次本质的内在统一”。邹先生把“客观实在性”看得很重要，因为没有客观实在性，知识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哲学的真理就不存在了。站在这个立场上邹先生维护知识共相和对象共相在统一的基础上的差别，并且批评了西方自贝克莱、休谟以来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淆。他认为，这些哲学都将知识共相和对象共相混同了，只不过有感性层面的混同，有理性层面的混同。比如经验主义者大多将感性知识共相与感性原始对象共相混同，而黑格尔则是在更高层次上将理性知识共相与理性原始对象共相混同了。这种混同的结果是以知识共相淹没了对象共相，因而西方哲学的本性必然是唯心主义的。

感性对象共相即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理性对象共相则是事物存在形象的本质实在性，二者的共相构成原始对象共相，也称客观实在性。邹先生认为，这个作为原始对象共相的客观实在性的内涵逻辑内容就是“自然”。哲学由此就变成了关于自然的学问，即自然哲学。关于自然，他又进一步区分为自然和自然界。“通常人们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界，但是在我们看来，自然与自然界是有区别的，二者不是一回事。什么是自然？自然者，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以其不同层次内在本质为基础，然其本身所固然的自生自化的一个过程之谓也——一切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在其普遍联系与制约中，都不能不是一个毫不借助任何外力的、自本自根、自生自化的一个然其所固然的实在性。而作为这样一个实在性的自然，在其所有数量中的总和统一性，这才是自然界。所以，自然不能等同于自然界，二者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将事物存在形象的不同层次本质，扬弃为它的固有内在性，则所谓自然与自然界的区别，便可简化如下：1，所谓自然，就是事物存在形象的实在性。2，所谓自然界，则是所有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的总和统一性。”具体说，哲学就是以自然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体为对象，所以可称其为“自然哲学”。但是邹先生的自然哲学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狭义的自然哲学是在社会性自然和非社会性自然相分的前提下只研究非社会性自然及自然界，而邹先生所谓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一般、自然界一般的思想体系，它是整个哲学系统的普遍基础”，即其“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

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部分。本体论讲客观实在性，认识论讲主观实在性，价值论讲主客统一性，是前二者的合题。但是按照邹先生看，它们同时也是逻辑，确切说是决定逻辑的来源和本性的基础性的东西。因为逻辑总是有内容的逻辑，不是空泛的形式，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所述内容恰恰也是逻辑的基本内容。可见，在这个环节上邹先生和黑格尔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在他看来，“逻辑学应分为客观逻辑学与主观逻辑学（传统逻辑学仅是主观逻辑学），和此二者的统一——主客观统一的共相逻辑学。它的梗概，分别包含于自然哲学即所谓第一哲学原理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之中”。从此看，这里所说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便也都是关于本体、认识、价值的逻辑表述，而不是某种活动的描述。

具体说来，“在合理的逻辑形式中，以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为对象，从它开始到其不同层次本质，并从其终极本质中演绎各种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的产生规律，便是本体论”。“在合理的逻辑形式中，以各种日常经验和各种科学为前提去反思知识共相产生、发展的规律，便是认识论。”“无论是知识，还是它的客观对象——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就其都是出自大自然内在之理的合理性，因而就它们在大自然中都是具有合理意义的东西说，这便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实在

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这便是天道的合理性。以价值为对象的学理,便是价值论。”^①这样,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本体论内容)和主观实在性(认识论内容)便在价值论中回归到了自然的合理性。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具体内容,极为丰富,足以体现邹先生丰厚的学养和缜密的沉思。其中的具体环节的论述,包含着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这些观点和论证有待于我们仔细研究。相信不同的读者会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受到启发。

三

应该说,邹先生最终形成的第一哲学,很多推演的细节还搞不明白,但按邹先生的学问,我相信邹先生是已经想明白了的,只是我们由于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思考或思考不深入而不太理解。所以这个系统中肯定还包含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需要挖掘。但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首先,邹先生将其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称为自然哲学,是很有其现实意义的。正像前面所提到的,自近代以来,一方面,科学技术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一直更新着现代化的进程,但更重要的一方面,资本借助科学技术,也一直更新着自己一种无限增值的进程。资本借助于科学技术所建立的信息手段,不断刺激着人的欲望,很多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欲望的满足手段。至于哪些科学技术真的是为人类谋幸福,哪些是单纯的满足欲望,人们已经分不清楚了。这样,科学技术的创造能力,便使人对自己的自信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人们对自然似乎总是摆出一副主宰者的样子,似乎自然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人而存在的。这在哲学上的代表就是人学的过分发展。我们知道,恩格斯曾经警告,如果我们蔑视自然规律,必受自然的惩罚。邹先生重视形而上学、重视自然哲学,将自然哲学比之以天道之学,实际上也在矫正着现在人学过分发展的片面性。从哲学史上来看,黑格尔曾经批判经验主义以致康德的意识之学,海德格尔也曾批评过人道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旨趣就是回归存在论,回归天道之学。邹先生面对人学泛滥的局面,倡导回归自然、回归天道,将第一哲学标示为自然哲学,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意义和黑格尔、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回归自然、回归天道是邹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最重要的遗产,值得我们深思。读邹先生的这个体系,他的话是有棱角的,一方面他是一个严厉的批评者,对任何哲学学派的缺点往往不留情面地直接指出来,从不隐晦;另一方面他也总是运用那种人们听起来会觉得十分难懂的思辨语言。但是,仔细体会他所展示的那种趋向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却能够使人们从某种人学的躁动中平静下来,给人一种怡然的感觉。

其次,就本体论问题来说,邹先生以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为起点建构的一种生命本体论是很有意义的。一般的本体论在西方是讲关于“存在”的学问,而邹先生则吸取并升华了现象学的成果,从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分析开始,所以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构成了基础。他认为,事物存在形象的实在性包含事物形象和存在形象两个环节,事物存在形象的全体性便是二者在区别中又统一的全体性。如果以事物存在形象的实在性的形体性为核心,将其不同方面的属性扬弃为形体核心的内在属性,那个“形体核心”与其内在属性的统一体,便是事物存在实在性。事物存在形象的实在性是基础,而事物存在实在性作为其最切近的本质,构成了对自然进行逻辑分析的起点。“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第一层次上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即它最初的本来面目,因而即为其最初层次上的本体,因为它的一切属性表现形象,都来源于它的不同属性。”^②正是通过对事物存

① 参见邹化政《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第一章。

② 参见邹化政《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第一章。

在实在性的分析，邹先生解释了自然作为有机生命的结构。前面说过，邹先生曾多次褒奖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即自然观。通过对事物存在实在性的两种属性的分析，他严密地展示出了这种自然观的基本性质。在邹先生看来，事物存在实在性基本上有两种不同属性，即物理属性和精神属性，它们处在既相连续又相中断的内在关联中。这样，展现于我们的自然便成为了一个有机联系体或生命体。本体论就是揭示这生命体不同环节的内在逻辑，最后凝结为客观逻辑。将自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为生命体，应该说不只邹先生一个人，好多哲学家都有过这样的理解，包括斯宾诺莎在内，但是能够达到邹先生这样系统建构的，应该是少之又少了。通过严格的论证达成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自然，是有很大益处的。

再次，在《第一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中，邹先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根本缺陷的把握也是很独到的。上面我们说过，邹先生研究西方哲学，特点是他能够进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去。他熟练地掌握了西方哲学的思辨论证方法，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更像是西方式的。可见他得益于西方哲学，但同时他对西方哲学的弱点或缺点也看得更清楚。前面我们说过，他在多年前就意识到，西方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哲学，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在这部著作中，他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自贝克莱、休谟以来，西方近现代哲学主流的基本特点，便在于知识共相，与其原始对象共相——事物存在实在性的混同。”在前面我们解释过邹先生关于知识对象、原始对象共相以及它们的区别和关联。当然二者是统一的，但邹先生在论述中更为强调它们的区别性。我猜测，这主要是因为在今日的哲学思潮中，对它们的区别性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性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原来我们坚持某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当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要通过我们的感觉/知性来被我们所感所知时，我们的感和知就成为第一位的东西。近代西方的“认识论转折”使我们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这和近代人学的转折也使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的东西一样。当我们说“桌子是黄的”、“天是蓝的”、“大地是绿的”等等的时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知识，但同时它也关联着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却不是知识创造出来的，而是原初的。邹先生把它叫做“原始对象”，这原始对象由于是感性显现的，所以被称为“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而它们的具体共相（作为普遍、特殊和个体统一的共相）就是“原始对象共相”，这也是“事物存在实在性”。从此看，“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是最基础的，但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却没有这个概念，而只有“事物存在实在性”的概念。不仅如此，还把事物存在实在性作为知识的原始对象共相和知识共相混淆了。邹先生特别分析了二者混淆的不同层次（见“导论”中“知识共相与原始对象共相的混同与它的层次”）。由于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的主流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性，所以邹先生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对近代和当代哲学本性的一种再认识。当然，事物存在形象实在性和人的感性相关，特别是和外感相关。而感性在西方传统中总是被贬抑的。其实，感性中隐藏着很多秘密。邹先生能够在感性形象的平台上看到事物的实在性，这和西方传统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如此，这种看法也为我们开出了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

应该说，邹先生是一位以缜密的思辨从事哲学工作的哲学家。他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都隐含在思辨的论证中。不去梳理他的思辨论证，这些价值很难凸显出来。所以，相信通过我们认真研读邹先生的著述，会有更多有价值的思想被发掘出来。

[责任编辑：白 刚]

Keywords: Zou Hua-zheng;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Marxist philosophy; near-Kantian interpretation

Return to Nature and Natural Law:

In Memory of Professor Zou Hua-zheng

WANG Tian-cheng (123)

Abstract: Professor Zou Hua-zheng was exploring truth in philosophy all through his life. But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subjects he explored were different. In his final work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he expressed mainly his final logical reflection on philosophy. Professor Zou called the science of first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natural philosophy” in broad sense, which includes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Here, Professor Zou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to natural life and it shows that Professor Zou had gone beyond himself to return to nature.

Keywords: Zou Hua-zheng; nature; natural law; ontology

On Paradigmatic Shift in Recent World History Studies

HE Ping, LI Ming-yu (130)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 paradigmatic shift occurred in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The new paradigm is characterized by a keen awareness of the global as whol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nd the use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disciplinary like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logy, etc., in the intellectual inquiry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a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manner. The focus of the new paradigm is on th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events of wide impac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The new paradigm contains three sub-fields, glob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global history is a common pattern across all cul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uman experiences. Trans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cross-boundary networks and interact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terflow of ideas, knowledge and cultural forms occurred before the form of modern states. Accompanying the paradigmatic shift is the re-fram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object of a discipline and the change of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paradigmatic shif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a big narratives. It only urges that even doing a micro study, one should also illuminate his topic by a wide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 vision.

Keywords: new paradigm of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tercultural studies

The Yasukuni Shrine, Hero Sacrifices, National Story:

The Gener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War Memories

ZHENG Yi (144)

Abstract: The Yasukuni Shrine is the sacrificial places of the war created by the Meiji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its own legitimacy status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which position above the general shrine and its ideological basis is the Japanese folk imperial hero sacrifices. With Japan's victor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Russo-Japanese War, the religious colors of the Yasukuni Shrine wer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he place of defend soul in the civil war (defend and comfort soul) into the place of hardening the memory of the war in the aggressive war (highlight the spirit). This function of the Yasukuni Shrine was further built into “national device” to solidify Japan's social war mem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Yasukuni Shrine became “temple” to concentrate Japan's history memories of the foreign war, which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of spirit encouragement and the “spiritual” collection in Japan's foreign aggression war mobilization.

Keywords: the Yasukuni Shrine; war memories; Japan's national Shinto;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ggressive war